

Reactions to Lenin's Death in China

Tan Xufeng

Abstract: After the death of Lenin, various discussions and commemorations took place in China. The Soviet revolution led by Lenin and its organizational methods became a model fo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Kuomintang and a talisman for securing Soviet support. Sun Yat-sen and the Kuomintang's commemoration of Lenin had pragmatic considerations, while the CCP used Lenin's memory as a guidepost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and, after Sun's death, as a tool to criticize the right wing of the Kuomintang and maintain cooperation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CP. In the meantime, Lenin's experiences and personality became a paragon for the CCP to be remembered, internalized, and utilized to attract and foster more followers of the revolution, serving as a possible model for many marginal intellectuals of the ti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Beiyang government and some critics boycotted and criticized Lenin as a caveat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extremism and over-radicalization. Many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academics reacted to the event with indifference, with some, like Wu Mi, even responding sarcastically. Following the success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Kuomintang core attempted to hollow out Leninism and repurposed it according to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Lenin,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symbol, remained a constant topic of discussion and a field of power in vari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scenarios.

Keywords: Lenin, Sun Yat-sen, Kuominta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emorations

Author: Dr. TAN Xufeng holds a Ph.D. in History from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t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Observing the Trend: Memory, Public Opinion,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Revolutionary Knowled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列寧逝世在中國的反響

譚徐鋒

[摘要] 列寧逝世後，中國各界展開了各種討論與紀念，列寧所領導的蘇俄革命及其組織方法成了國民黨改組的範本，也成為他們贏得蘇俄支持的護符，孫中山與國民黨悼念列寧具有某種實用考慮。中共將紀念列寧當作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指針，孫中山去世後，紀念列寧成了中國共產黨批評國民黨右派、維繫國共合作的利器，而列寧的經歷與人格也成為中共念茲在茲的榜樣，內化於心，借此吸引與培養更多革命追隨者，為當時不少邊緣知識分子提供了可能的示範。北洋政府與批評者則借抵制、批評列寧，來提醒世人注意可能的過激化。不少大學教授則對列寧逝世頗為淡然，甚至有像吳宓一樣語帶譏諷者。隨著北伐的成功，國民黨核心層很快試圖將列寧主義架空，用三民主義進行重構。列寧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符號，在各種政治社會場景中成為綿綿不絕的話題庫與力量場。

[關鍵詞] 列寧 孫中山 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 紀念

[作者簡介] 譚徐鋒，歷史學博士，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政治史、社會文化史與史學史，代表作為『察勢觀風——近代中國的記憶、輿論與社會』、「清末革命知識的製作與流動」。

蘇俄締造者列寧是近代世界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由於社會主義思潮在當時的中國已經蓬勃興起，蘇俄與中國各派的關係也日漸密切^①，列寧在中國也廣受關注^②，而一年之內美國總統威爾遜、中國國民黨領袖孫中山也先後去世，無形中又讓人聯繫起來。識者注意到，當時國人政治理念上認同“從威爾遜到列寧”的變化；1927年1月，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吳宓在演講裏感慨，數千年來孔子在中國人心中的神聖地位，“已讓位於馬克思和列寧”^③。列寧的逝世是一個政治史事件，也是一個思想史事件，產生了很多反響，誰在紀念，哪里在紀念，如何紀念，紀念了之後怎樣^④；誰在反對，如何反對，都反映了當時的世道人心。除了出於頌揚的紀念，也有漠視、批評甚至反對，此前研究很少關注。筆者不僅僅關注某一黨派某一區域，而是嘗試整體觀察列寧逝世在中國的反響。除了關注發言評論之外，更關注相關言論的碰撞，還關注反對與禁止的聲音，圍繞如何運用紀念列寧來塑造政治派別的合法性，展開政治鬥爭與打造革命領袖形象吸引革命追隨者來展開，呈現頌揚、制止、批評與漠然的多元場景。這些反響因應著當時中國國內政局與社會思潮的形勢，由列寧之死在中國的波瀾，可以透視當時的社會與政情。

一 方法與托孤：國民黨的列寧紀念

列寧逝世前兩年，中國報章陸續有其病重的報導，反反覆復，傳言很多。^⑤

列寧逝世的消息傳到中國，正值孫中山聯俄聯共，國民黨要人除胡漢民等右派外，都對蘇俄表示高度友好，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根據李宗仁的觀察，當時廣州人士對於蘇聯頗為推崇，“俄國顧問們在廣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鮑羅廷的公館，大家都以一進為榮。一般幹部如能和鮑某有片語交談或同席共餐，都引為殊榮；大有一識荊州，便足驕人之慨”^⑥。

列寧逝世前一天，孫中山談國民黨改組問題，認為俄國革命不經世界最大威權之帝國主義推翻，而且解決了世界經濟政治諸問題，稱讚蘇俄革命“真是徹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⑦又談到此次革命，“先講方法，然後才去實行”，俄國人立志革命百年成功，很快就成功了，而中國革命三十年尚未成功，“是因為中國人革命的方法和氣魄不及俄國人”，“無論做

① 本文成稿於2019年，最初提交2019年8月31日—9月1日舉行的“紀念共產國際成立一百週年——百年中國的跨學科對話”討論會（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京大學研究生院主辦），當時列寧紀念研究還相當少。“五四”前後國人的蘇俄觀，楊天宏等做過深入討論，參見楊天宏、付天星「近代國人對蘇俄認知及其變化——基於民國時期民意調查的分析」（『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020））。中國近代政治紀念的研究，郭若平『塑造與被塑造：“五四”闡釋與革命意識形態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陳金龍『中國共產黨紀念活動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等書值得關注。近四年對於列寧紀念的專題研究陸續出現，參見周遊「形象和話語的塑造：國民革命時期中共對列寧的紀念」（『史林』1（2022））、鄭康奇「中國社會各界紀念列寧話語研究（1924—1927）」（『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2（2020））、鄒芬「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列寧形象建構」（『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6（2020）），筆者並非僅僅關注列寧紀念活動，而是力圖全面呈現各方相關言論的競爭與互動。

② 北京大學進行民測，推舉世界第一偉人，497票中列寧得227票居第一，威爾遜以51票居第二，可參見朱務善：「北大二十五週年紀念民意測驗之分析」，『新民國』第1卷第4期，1924年3月30日出版。朱氏與羅章龍關係很近，曾聯合發起蘇俄共和紀念大會，參見『北京大學日刊』1922-11-07，第2版。

③ 參見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修訂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第270—272頁。

④ 既有關於記憶、紀念的研究相當多，其中較重要的有[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畢然、郭金華譯；[法]皮埃爾·諾拉主編：『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全本見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tome 1-3 (Paris: Gallimard, 1997)；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納日碧力戈譯；[法]布魯諾·佩基尼奧：『集體記憶與新記憶的產生』（『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2012年12月第4期）。中國史領域關於中國近代領袖人物記憶、紀念的研究主要有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尤其是第四章、第六章關於英雄祭祀、孫中山奉安大典的論述；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李恭忠『中山陵：一個現代政治符號的誕生（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不過本文主要關注的是列寧逝世後各方言論的競爭，鑒於清末開始對於大人物逝世的相關禮儀已經逐漸格式化，筆者對於儀式有所涉及，但不作為重點。

⑤ 如「俄國待斃之飢民數將有二千萬人 列寧病勢未輕」，『京報』1922-03-29，第2版；「列寧將一病不起說 醫家診查之結果」，『益世報』1922-04-01，第3版；「列寧之近況 病危之謠傳不確 目下仍力疾著書 社會黨將開大會」，『京報』1922-04-21，第6版；「列寧之病狀 不久可愈」，『晨報』1922-05-13，第6版；「列寧病勢危急」，『益世報』1922-06-06，第6版；「列寧病勢沉重 俄政府正式報告病狀」，『晨報』1923-03-15，第3版；「列寧身遭幽禁 死耗屢傳之內幕」，『京報』1924-01-14，第3版。

⑥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第237頁。

⑦ 孫中山：『國民黨改組問題』（1924年1月20日），『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514頁。

什麼事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強調要向俄國學習。^①

得知列寧逝世，孫中山在大會發表演說，對列寧之死表示悼念，認為“俄國革命奇功偉績世界革命史前所未有，都緣於列寧個人奮鬥與組織之完善，列寧“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俄國革命於中國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應向俄國革命黨學習，鞏固黨的基礎，“成為一有組織的、有力量的機關”，也是此次大會之目的。

在他看來，列寧雖然去世，但對俄國不會有什麼影響，“因為列寧先生之思想魄力、奮鬥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結晶在黨中”，身體雖不在，精神仍在，堪稱給與國民黨最大的教訓。

反觀革命生涯，孫中山反省到，革命未完成，是由於黨不鞏固，黨員不遵守命令，各自為政，“既沒有盲從一致信服的舊道德，又沒有活潑於自由中的新思想”。中華革命黨就是為此創立的。在大家習以為常之時，他鑒於湧現了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人民程度增高，革命事業，國民只覺得太慢，不以為太快。所以這次改組，要把國民黨團結起來、加強起來，迎合全國國民的心理，遂將總理制改為委員制。

孫中山坦承要效仿蘇俄的精神，稱改組“就是本總理把個人負擔的革命重大責任，分之眾人”，不要因為他個人而有所興廢，如列寧之於俄國革命黨一樣。

在其演說另一版本，孫中山認為，倘不能像蘇俄一樣形成有紀律之黨，“則吾國革命事業，終為服從於個人，一旦個人有變動，則革命主義亦將大受影響，故此次之會議，乃予以數十年信奉之主義，付託於同志之起點”。

在此，孫中山顯然認為“以俄為師”是改組國民黨的不二法門，為此不惜將已經集中的權力分與眾人。戴季陶擔心世人無法理解，在致蜀中諸友長函中，對列寧之死與孫中山演說的心境進行了詳細解讀，“此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精神的意義，是在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之孤兒，付託於全國同志全體，要求全國同志，以革命的、協作的、規律的精神，負擔此孤兒至於成立之責任”^②。

為了表示對列寧逝世的重視，孫還派其子孫科赴俄進行悼念。^③

此後孫中山去世時，戴季陶闡釋孫氏關於孝的論述，“下半旗，守靜默，服喪，開追悼會，以及作種種紀念興行，都是人們對於先生表示孝思”，“對於過去的感激，對於現在的安慰，對於將來的努力”，三者能一致，“才是真孝，才是大孝”。依此邏輯，對於列寧的悼念無疑也是“表示孝思”的一部分。^④

隨後，孫中山宣佈各行政機關將降半旗致哀三日，國民黨“一大”亦休會三日。最後則請俄國人鮑羅廷講述列寧生平事蹟，隨即通過哀悼列寧的提議案。^⑤

2月24日，國民黨在廣州第一公園舉行追悼列寧大會，祭臺高懸孫中山手書“國友人師”祭幛。大會由廖仲愷主持，孫中山主祭並致悼詞：“所冀與君，同軌並轍。敵則不樂，民乃大歡；邈焉萬里，精神往還。”^⑥

在如此短時間，孫中山如此頻繁地強調蘇俄成功的方法與國民黨自身失敗的教訓，其內心迫切可見一斑，珠玉在前，其關切點卻是如何用蘇俄革命的方法改造國民黨，使其能夠成為一個有力的政黨，促成中國革命成功。

時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成員、曾以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的身份與孫中山談判過的達林正在廣州推動國共合作，在他看來，“這個祭文反映出孫中山的世界觀已發生了急劇轉變”。改組補充

① 孫中山：「歡宴蒙古代表及國民黨全國代表的演說」（1924年1月20日），『孫中山選集』下卷，第516、518頁。

②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十三年（1924）（一月至三月）』（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0），第205-207頁。

③ 「孫中山遣子赴俄」，『社會日報』1924-02-17，第3版。

④ 戴季陶：「孝」，『戴季陶最近言論集』下編（上海：大東書局，1928），第102頁。

⑤ 「關於列寧逝世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36-138頁。

⑥ 「追悼列寧詳情」，廣州『民國日報』1924-02-25，第6版。

了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給國民黨帶來了無比巨大的力量，他們把列寧的思想帶到了人民群眾之中”^①。

不同於孫中山等國民黨領袖的政治關切，廣州『民國日報』記者稱列寧為對抗資本帝國主義之先鋒，與林肯一樣為人類謀求解放自由，在經濟壓迫的世界環境下，尤其需要列寧這種人物，今後應該繼承列寧遺志，“努力謀推翻今日之資本制度，而變為適於民生之新組織”^②。

上海『民國日報·覺悟』自列寧逝世之日起，也大量刊載列寧的遺著與相關評論、詩歌，對列寧進行了較為深入的介紹。

兩年後，在紀念列寧，同時回憶孫中山國民黨“一大”的這一發言時，中共領袖李大釗提到兩年前廣州大會追悼列寧，中山非常沉痛，“列寧死了，俄國決不危險，因為他們已經有了很完密堅固的組織。假使我死了，你們看中國如何？我們的黨如何？”大家當時頗為悲傷。

這裏面的沉痛，在孫中山對宋慶齡談為何要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時也如出一轍，“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③。

在以其個人名義致電悼念列寧時，孫中山以為，“他的著作也將永存，因為他的著作是建立在一定會掌握和統治未來人類的思想和希望的這樣的社會觀念上的”^④。

緊接著，廣州市內政府大樓、輪船，以及大本營都降半旗致哀。^⑤

孫中山還致電蘇俄駐華代表加拉罕，盛讚列寧為新俄國之創造者，其事業正是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之精神。^⑥

29日，加拉罕以英文復電表示感謝，孫中山速命人譯出發表，來電稱“蘇聯政府謹遵列寧同志遺教，繼續進行解放世界被壓迫民族，特別是東方被壓迫民族，而尤以中國國民黨解放中國民族脫離帝國主義羈絆之工作，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之基礎，以促進民治主義之大聯合”^⑦。這裏的“民治主義”值得留意，所謂“民有、民治、民享”，其中跟後面所豔稱的“民主”是一脈相承的。孫中山稱讚列寧是人類中的先知先覺。^⑧

無論是戴季陶所理解的“托孤”，還是孫中山言論所透露出的憂慮與致敬，其實都是期望國民黨能夠有一個蛻變與掌握未來的可能，如何能使國民黨獲得通過汲取蘇俄式革命動力，獲得新生，這是孫中山念茲在茲的重點，而蘇俄與列寧^⑨的成功既是動力，也是壓力。

1926年1月21日上午10時，列寧逝世二週年，黃埔軍校舉行紀念大會，全體官長學生第三團入伍生、俄國顧問加拿覺夫參會，鄧演達主持會議，“大眾齊向列寧遺像行三鞠躬禮，次奏樂，全場起立默念三分鐘”，然後演講，熊雄並將參加列寧出殯日民眾追悼的情形一一陳述，“全場為之默然”。^⑩

1927年1月21日，黃埔軍校舉行“世界革命導師列寧逝世三週年紀念大會”，政治部主任熊雄講述俄國共產黨成功的五大原由：有黨的紀律，黨建立在工農群眾基礎上，能聯合世界一切受壓迫民眾，黨有科學的方法和理論，黨的行動理論一致，稱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就是要學蘇俄這五點，應肅清黨內一切投機分子，“才能使本黨有嚴密的組織，有鐵的紀律，去打倒軍閥，打倒帝

① [蘇]C.A.達林：「哀痛的日子」，《中國回憶錄（1921—192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侯均初等譯，第147頁。

② 永生：「悼列寧」，廣州『民國日報』1924-01-26，第2版。

③ 『宋慶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第109頁。

④ 「列寧逝世電文」（1924年1月25日），『孫中山選集』下卷，第538頁。

⑤ 「鮑羅廷給加拉罕的信」，『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第405頁。

⑥ 「總理孫文復蘇俄代表加拉罕電」，中國國民黨黨口檔案第17140.2號。

⑦ 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第六冊（臺北：財團法人羅剛先生三民主義獎學金基金會，1988），第4562頁。

⑧ 孫中山：「三民主義 民族主義 第四講」（1924年2月17日），『孫中山選集』下卷，第631頁。

⑨ 列寧對其接班人問題也不是毫無憂慮，對於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如何共事並無良策。參見周尚文等：『蘇共執政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372頁。

⑩ 「黃埔軍校紀念列寧情形」，『工人之路』1926年第212期。

國主義！”^①

國民黨人于右任的密友、著名報人張季鸞稱“歷史上所謂大英雄，其事業往往僅代表一民族或一國家為止，而列寧之理想，則為人類的，其事業則世界的”，在沙俄破壞其政治組織，將社會組織、經濟組織推翻，建立空前的勞工專制政體，巍然成為世界資本主義之對手，就此而言，列寧堪稱千古一人，“列寧者時代之產物，其理想與事業，莫不為時代所造成”，歐洲資本主義文明及其弊端激發了共產主義，俄國惡政及貴族獨佔經濟激發了革命，“且必遇歐戰之大爆發，而後列寧得實行之機會，是以列寧之事業果有功，人類之功也；果有罪惡，時勢之罪惡也。因之，列寧六七年來之試驗，人類歷史之重要試驗也”^②。

南社盟主、身在江蘇吳江黎里的吳江縣黨部負責人柳亞子，時刻關注全國報章關於列寧逝世的資訊。他注意到，連“反革命主義的和平政客”章士釗對於列寧都評價極高，“就可以知道列寧氏感化力的不可思議了。我哀悼列寧氏，我更希望中國有列寧第二出世，替我們頹廢的民族出一口氣！”^③

有人將列寧與墨索里尼、凱末爾相提並論，柳氏對此進行了辯駁，在他看來，後兩者“都是反革命主義的退化者”，趁大亂之後“利用國民的惰性，倒行逆施，想把政局在進化軌道上開倒車轉去”；凱末爾“在土耳其本國，的確是第一流人物，但他和全世界的關係，似乎還不甚普遍，因為他是實行家，不是主義者”，都比不上列寧。在柳亞子看來，符合進化思想、具有某種主義，才是列寧的最重要特徵。他甚至將文章命名為「拜孫悼李樓隨筆」，其中的“李”指列寧，他認為，放眼世界，能繼承與發揮列寧者只有孫中山，柳氏援引高君宇在列寧紀念大會上的發言，稱讚孫中山是知行合一有學問有主義的大師，“列寧的成功，是靠蘇維埃聯邦人民的擁護，我們中國有孫先生這樣偉大的人物，倘然不能夠合全國人民的力量去擁護他，那真是國民的羞恥，民族的羞恥了！”^④

他還提出，蘇俄的成功是列寧奮鬥的成果，但列寧不能一人創造這一切，共產黨的信任和人民的擁護是列寧成功的原料，民國是病人，孫中山是個有學識的醫生，病人要病好，非信任有學識醫生不可；民國要免於亡國，非信任孫中山不可，而國民黨改組宣言則是孫中山診察病情的脈案和方劑。孫的學問、道德、氣魄、才能都不在列寧之下，之所以不成功，是因為大家不加入國民黨，因此柳氏號召大家加入國民黨，幫助孫去奮鬥，並且以之為唯一的大路。^⑤

5月1日是勞動節，柳亞子列舉了1924年三大與勞動階級有關的世界大事，頭一件便是列寧之死和蘇俄外交的勝利，列寧之死是勞動階級的重大不幸，“不過列寧雖死，主義不死，他所代表的蘇俄聯邦，從前受過資本主義的列強極端迫壓的，卻在他死以後，漸漸被列強承認起來”，認為這代表勞動階級的勝利。^⑥

在柳亞子筆下，列寧的偉大儘管可貴，然而孫中山也能與之比肩，而且倘非國民的懈墮，孫中山甚至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作為身居鄉里的國民黨員，柳氏的用意顯然是想鼓動更多人加入國民黨，以便擴充後者的影響力。

孫中山死後，柳氏給朋友的信中再三強調這一點，強調孫中山不僅講廣義的民族主義，而且提倡民權、民生，並世只有列寧可以跟孫相提並論，朋友將孫比作華盛頓不合適，並稱引孫中山葬事籌備處總幹事楊杏佛的話“孫先生是薄華盛頓而不為的”。^⑦

柳亞子之所以這麼積極地將孫中山與列寧相提並論，不僅僅是為了讚揚孫中山的偉大，更多

① 「列寧逝世三週年紀念大會紀事」，《黃埔日刊》1927-01-02。

② 一苇：「列寧逝世」，上海《中華新報》1924-01-24，第1張第2版。

③ YT：「哀悼列寧氏」，《新黎里》1924-02-16，第2版。

④ YT：「拜孫悼李樓隨筆·列寧和孫先生」，《新黎里》1924-02-16，第2版。

⑤ YT：「國民救國的一條大路」，《新黎里》1924-03-01，第2版。

⑥ YT：「五月一日」，《新黎里》1924-05-01，第3版。

⑦ 「柳亞子答任夢癡的信」，《新黎里特刊》1924-05-16，第2張第4版。

是為了借孫中山的感召力來提振國民黨內部的凝聚力，同時也不無對於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內部面臨分離的隱憂。這種隱憂在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各派對於列寧的紀念態度不一就可以看出來，尤其是隨著北伐的勝利推進，各方的差距越來越大。

不過，北伐前，國民黨內部對於聯俄相對而言還比較一致，孫中山生前得力幹將、國民黨要角胡漢民在國民黨中央機關刊物『中央半月刊』創刊號發文，認為與馬克思主義相比，列寧主義增加了民族主義，是其進步，不過三民主義已經都相容並包了。^①這與其說是在表彰列寧，不如說是在誇讚三民主義的無所不包，實則隱含揚棄的意味。同期還發表「列寧主義的弱點之暴露」，認為列寧的革命理論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之所謂工具，是用得著的時候就利用，用不著的時候就要拋棄，甚且要打倒的”，“列寧主義者終要事實上成為無產階級和東方民族真正自覺獨立的革命運動的敵人”。^②

胡文發表前，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李石曾等約胡氏去南京參會，並出示“查辦共產黨案”，早已有反共之心的胡漢民見到該案後，一拍即合，不久公開反共。^③可以說，隨著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內部不少實權人物對於聯俄、紀念列寧已經不再積極，重心反而放在了反共這一層面。

二 先賢的誕生：中共的列寧紀念

作為中共領袖，陳獨秀、李大釗對於列寧的逝世格外重視。當時李大釗在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大，參與了當地紀念活動。廣州追悼列寧並紀念“二七”大會，繼鮑羅廷講述列寧的生平之後，李大釗演說，強調列寧是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與民族，尤其是東方被壓迫民族若中國，一件莫大的損失”；並揭示列寧刻苦簡樸，堪稱中國國民革命者的模範。^④

中共『嚮導』『中國青年』雜誌則出了一個專輯或專號對列寧逝世進行了紀念，陳獨秀等人多次撰文評價列寧。

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書記張太雷常駐莫斯科，第一時間向國內報導了列寧逝世的消息，他交代了列寧染病前後的情形，俄國工農聽說列寧無恙，都歡呼鼓舞，驟聞其病逝，“沒有一個不眼含淚而直視，心驚如大石沉海”。當蘇維埃大會報告此事時，老年的勞工代表都大哭起來。在他看來，列寧染病之間，國事與黨務運作正常，甚至日益強盛，“俄國決不因列寧死而有所變動”。列寧棺木轉移到職工聯合會會所途中，民眾皆脫帽致哀，儘管軍警列隊阻止有人闖入，還是屢有老幼爭相闖入重圍：

街中激靜，兩旁觀者無數，然而一聲不聞。街旁房屋壁上列寧底像和紅黑布密密地掛起，男女老幼都臂繞紅黑布，以示哀悼。各團手中所持紅心黑邊旗子中寫：“列寧死了！但是他底工作存在！”“列寧死了，但是他在世界農民和工人底心目中是永遠活著！”“我們底領袖死了！我們應格外地團結和努力！”

張氏估計到出殯那天，全城三百萬人會有三分之二參與。^⑤

1月22日上午，在蘇俄留學的任弼時聽到列寧去世，立即手繪了列寧遺像一幅，參與校內追悼會。25日，任與蕭三等去嚮列寧遺體告別，並被安排代表東方民族榮譽守靈五分鐘。^⑥

同在東方大學的鄭超麟在列寧逝世前就聽人“傳說列寧病不會好；據說，布哈林在某處演

① 胡漢民：「三民主義之認識」，『中央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27年6月15日出版。

② 劉霆：「列寧主義的弱點之暴露」，『中央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27年6月15日出版。

③ 參見周聿峨、陳紅民：『胡漢民評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第187頁。

④ 李大釗：「在廣州追悼列寧並紀念“二七”大會上的演講」（1924年2月7日），『李大釗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第373頁。

⑤ 泰雷：「列寧底死」，『民國日報·覺悟』第2卷第19期，1924年02月19日出版。

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第26頁。

說，說列寧腦組織已經破壞，即使不死也成白癡的”，當時東方大學“派遣學生看守電話，非有正式許可書，誰也不許打電話”。列寧逝世，北洋政府派袁慶雲與張開運到東方大學監視中國學生。^①

列寧逝世後幾天，蘇俄『真理報』就發表了孫中山為列寧致哀的電報，使得當時留蘇學生更重視中國出版物了，彭述之抱怨“我們的理論刊物『新青年』變成普通的無聊的空談哲學文學的雜誌了！”對瞿秋白改編『新青年』甚為不滿，刊登了不少小說和文學，同時內部刊物『黨報』第一篇是「中國共產黨應否存在」，彭對此極為生氣。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決定寫文章給中國刊物，鄭超麟提議『新青年』出一期列寧專號表示紀念，不斷推動其出版。

由此可見，彭述之計畫佔領『新青年』編輯部，很大程度上源於列寧專號的出版，後來彭如願從瞿秋白手裏奪得了『新青年』雜誌。^②

24日，曾在蘇俄受到列寧接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高君宇撰文悼念列寧，認為最主要的是“忠實的瞭解列寧主義”，還闡釋列寧新經濟政策，這是一個過渡，今後就是“階級的消亡”。^③

26日，北京各界近千人在北京大學第三院大禮堂集會悼念列寧。場中懸掛列寧遺像一幀，並印製列寧相片分贈與會者，全體向列寧遺像行三鞠躬禮。馬敘倫任大會主席，稱讚列寧是全世界勞動領袖、全世界平民革命的首領、全世界弱小民族的提攜者、馬克斯學說的大師，其逝世使得俄國失去中流砥柱，全世界也失其依循。顧孟餘也發表演說，稱讚列寧的功勳，號召繼承與發揚列寧遺志，為社會謀福利，為國家放光明。^④

有人提出，“因為我們素來對於蘇俄革命，極表同情，以我個人意思，要求我國政府承認蘇俄政府；如政府不肯承認時，可由國人自行向蘇俄政府表示態度云云”^⑤。

高君宇介紹列寧生平，認為中國沒有如此偉人，中國人裏面“孫中山先生庶幾近之”。與會者以青年學生為多。大會表決通過決議，電賀孫中山改組國民政府，並請政府正式承認蘇俄，還致電蘇俄政府及列寧家屬慰問，同時還提議在中央公園舉辦一大規模之追悼會，“籌備在中央公園立紀念碑，以作尊崇列寧之表示，而為永久之紀念”^⑥。

正是在中共這裏，孫中山開始被頻繁與列寧相提並論。

陳獨秀發表「列寧之死」，闡述個人主觀意志儘管“決不能創造客觀上絕對不可能的東西”，“而在客觀上可能的範圍以內，卻有個人意志迴旋的餘地，並且必須有此個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創見，這客觀上的可能才能夠適當的實現”。^⑦

當時中共的列寧紀念，有著頗強的排他性，即只允許讚揚不允許批評，出自共產黨人的言論，除了緬懷，不太容許批評。對於他人的批評，也隨時出以反批評。

同期『中國青年』一作者敬雲不滿“上海各報均著論批評他的為人”。『商報』稱“今之論世者每謂土之基瑪爾（引者按：今譯凱末爾），意之墨索里尼，俄之列寧，為現代三大怪傑，信非溢美之辭”，敬雲以為這是“拿洋燭與黑暗二者比日光”，凱末爾“是一個會打仗的赳赳武夫”，墨索里尼則是“殘殺工人，獻媚資本家的一個變節的社會黨”，遠遠不如列寧這位蓋世的

①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第1卷，第217-218頁。

②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1卷，第219-220頁。

③ 高君宇：「對於列寧主義的誤解」（1924年1月24日），『高君宇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第184-185頁。

④ 「京團體遙祭列寧」，『時報』1924-01-29，第1張第3版。

⑤ 「京團體遙祭列寧」，『時報』1924-01-29，第1張第3版。同版也引路透社華沙電，說列寧去世後莫斯科政局複雜，幕後操作頗多，托洛茨基不得勢云云。

⑥ 「遙祭列寧大會紀」，上海『民國日報』1924-01-30，第2張第6版；「京團體遙祭列寧」，『時報』1924-01-29，第1張第3版。不同報紙對於發言者的稱謂頗不同，『時報』多以匿名稱之，似乎意味著其立場的中立。

⑦ 獨秀：「列寧之死」，『中國青年』第1卷第16期“列寧特號”，1924年2月3日出版。

思想家、革命家與政治家。

敬雲認為更可笑的是『時事新報』，該報說列寧“在知識線上為失敗，……毋甯謂發明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柯爾其功績較大也”，敬雲認為柯爾名聲甚小，只是在研究室內推求理論，而不顧社會運動的實際，“如英國之柯爾和中國之張東蓀等，雖知識之份量不同，然其懶惰，麻木，想吃現成飯，想藉著書或看書，描寫空想以安慰自己的痛苦的良心，想不損資本家的毫毛以實現社會主義之疲頑心理則無二致。故認識為古董，玩物，而奮鬥成功所用的知識則不認為知識，反認為知識上之失敗”。張東蓀是當時『時事新報』副刊的大將，這裏指名道姓批其“懶惰，麻木，想吃現成飯”，可以說炮火相當猛烈。

敬雲表示“我們則只認識為應付環境的工具，其高下應以能戰勝環境之程度為正比例”。列寧之偉大正在於此，他引述其他人的話，認為列寧偉大過人處在於其一種特性，“他決定一個某目標之後，他還要從實際找尋達到目標的工具，他不以既決定了那目標為滿足，他還要具體的完全的想出一切用以達到那目標所不可少的東西”，值得徒具理想而不知方法的青年反省。

陳獨秀注意到，很多此前恭維帝國主義、軍閥財閥，“極口譏謗過激派”的人，也去參加列寧追悼會，還附和著要給列寧建紀念碑，他認為列寧的偉大在於“扶助勞苦平民，反抗一切帝國主義及軍閥財閥”，對這批轉向恭維者不以為然。^①

羅章龍則將先後逝世的美國總統威爾遜與列寧做對比，以為世人紀念威爾遜存在誤解，威爾遜以美國資本主義的代表參加巴黎和會，釀成很多糾紛，所提“十四條”不但歐洲資本主義反對，連美國資本主義也反對，有欺騙弱小民族騙取虛名之嫌疑。而列寧則是創造蘇俄，反對資本帝國主義，“極忠實的扶弱抗強”，一戰時反對戰爭，而威爾遜則參與戰爭，兩者高下立判。^②

即使並不激烈的商榷意見，敬雲也不以為然。有人提出在中央公園給列寧立紀念碑，『中華新報』表示“尚非其時”，會“影射我國民之崇拜列寧主義”，“對內失實，對外徒遭誤解”。這一表示遭到敬雲逐條反駁，認為此舉乃民心所向，在中央公園立碑，“可以感化每個青年學著列寧奮鬥推翻政府，打翻政客的寄生生活，而且這種紀念碑立在中央公園可使一般政客的良心發抖”，而“中央公園只有立哈丁碑和參戰紀念碑的，只有證明中國人是會像母豬一樣伏在地下，任哈丁開刀纔算對外不招誤解的，如何敢立一個反抗壓制的英雄紀念碑呢？”最後怒嘲“中華新報之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對立哈定紀念碑，‘對外徒招誤解’，我們是豬不是人呢？”^③其實，『中華新報』對於列寧逝世的言論整體而言相當溫和，而且對於列寧其實頗為推崇。

3月9日，湖南省舉行追悼列寧大會，李維漢認為在科學的社會主義歷程上，列寧與馬克思是先後相應的偉人，列寧聰明而全面地接受馬克思主義，把唯物史觀活潑潑地應用於解決一切問題。中國人民所受的痛苦，思想之紊亂，除了採取列寧改造世界的方案與唯物史觀，別無他途。中國人民不願自救則已，如願意則必須“急起承認蘇俄，與被壓迫民族攜手進攻帝國主義列強不可”，而蘇俄三次派全權代表來華，其心可感。

他批評中國知識界浪漫主義、直觀主義等唯心論，稱譽列寧不僅去歷史上尋原因，而且善於“綜合考察批判眼前之事實以求得新的進展的工具”，這緣於列寧善學唯物史觀，被他用於蘇俄革命，成為求得人類真理的工具，號召中國知識界接受唯物史觀。^④

5月1日，四川成都舉行追悼列寧大會，發表宣言對列寧表示悼念。中國青年共產黨領導人楊闇公發表演講，惋惜列寧這位“為我們人類推倒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急先鋒”之死，他列舉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尤其是英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事實，從軍事、經濟、文化方面都有狠毒的形式，應該發揮排斥外國帝國主義的民族精神，而不是“因此增加崇拜外力，迷信英美的程

① 獨秀：「列寧碑」，『嚮導』1924年第55期，1924年2月20日出版。

② 章龍：「威爾遜與列寧」，『嚮導』1924年第53、54期，1924年2月20日出版。

③ 敬雲：「列寧逝世之後（雜感）」，『中國青年』第1卷第16期“列寧特號”，1924年2月3日出版。

④ 李維漢：「列寧與中國」（1924年3月9日），『李維漢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10-14頁。

度”。

楊氏哀歎中國民族精神和愛國精神薄弱極了，不如前清，反倒變成媚外與崇拜洋大人的奴隸，現在連中國的民族思想也被征服，寄希望於國民革命團體，號召青年人進行系統宣傳與嚴密組織，向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進攻。^①

不過，也有其他人出於現實考慮而懷念列寧。1924年，胡愈之發表「李寧和威爾遜」對列寧和威爾遜進行對比，此前威爾遜因提出十四條被國人追捧，以為“摩西再世”，那時列寧還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知道的，也說他是“過激派亂黨”首領。可是過了五年，情形大不相同。“他的十四條，畢竟還是騙人的，現在已沒有人再上他的當了”，國人追悼威爾遜，遠不及去年追悼哈定總統，雖然哈定總統華盛頓會議，對於中國的實惠，未必比威爾遜總統多些。“李寧呢，可就兩樣了，他現在成為無產階級的救星，成為億兆人民所膜拜的偶像。雖然仇恨李寧的人到處都有著，可是已沒有一個人敢說李寧是亂黨暴徒了”。^②

是否給中國帶來實惠，威爾遜的泡影，輸給了列寧與蘇俄的實際行動。他甚至由此說自由主義是反動派的護身符，列寧之死是在全世界播撒火種，即將有一觸即發之勢，號召國人“你們的運命應該是在這時候定下了”^③。

同時，還存在不以黨派截然劃分的紀念，比如1924年3月23日下午的天津列寧紀念，列寧紀念作為一個場景，呈現了參加者的各種訴求。

籌備會先在『大公報』發佈通告，稱列寧之死，“先生在世懷抱，為世界被壓迫同胞謀幸福之主義”，甘作犧牲，為平等奮鬥，為自由奔跑，其行可法，其逝可哀。^④

『大公報』稱天津本地青年社、直一中學、平民學校、積微社、婦女日報社、新民意日報館、工專學生會、女權運動同盟會、女星社、達仁女學學生自治會、覺悟社、南中自治勵學會、學生同志會、綠波社等十四團體發起列寧追悼會。26日7時開第一次籌備會，各團體代表到會者20人，議決於3月16日下午1時半開追悼會，地點待定，分為總務部（含文書、庶務、會計三股）、交際部、出版部（含編輯、印刷），推定籌備主任兩人積極進行，還決定請加拉罕、李守常來津演講。^⑤

會議由天津各學校學生及各研究學術團體舉行，到會者五百餘人。演說臺後設有列寧遺像並各樣花圈，懸掛挽聯一千餘副，到會者各佩白花一朵。

開會之秩序分為獻花、宣讀祭文、唱國際歌、自由演說。商會代表夏琴西報告英、法、日三領事強設水閘事，北洋大學代表魯復周報告風潮之經過。

自由演說階段，劉清揚稱列寧系研究馬克思學說之一，列寧重在實行馬克思的學說，才能推倒不良政治，打倒資本家，為窮苦同胞謀幸福，號召繼承列寧事業。唐山京奉鐵路局製造廠工人代表王麟書、李福慶演說稱讚列寧給勞動界造福，應當據堅忍不拔的心實行列寧主義，不辜負其志願。達仁女學校學生自治會代表鄧女士認為，之所以悼念列寧，是要給生人做一個誓言，實行他的主義。天津青年社代表韓君表彰列寧主張交還在中國的租界地，拋棄一切不良的政治，主張庚子賠款作中國教育經費。救國團代表宋朝義稱中國現在制度不良，要想改革，就要快快實行列寧主義。高等工業學校代表楊鳳樓稱開追悼會還受官府壓迫，“列寧是我們的同志，壓迫我們，就是壓迫列寧”，應該起來抗爭。商會代表夏琴西報告英法日三領事在南牆子外設閘經過及交涉情形，“水閘一設，農夫不得灌溉，船戶不能行船”，認為列寧是打破帝國制度、推倒壓迫，號

① 楊闇公：「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楊闇公在成都追悼列寧大會上的演講」，『楊闇公紀念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周勇主編，第241-249頁，原載成都社會主義研究會『追悼列寧紀念號』1924-05-01。

② 化魯：「李寧和威爾遜」，『東方雜誌』第21卷第3號，1924年2月10日出版。

③ 化魯：「李寧和威爾遜」，『東方雜誌』第21卷第3號，1924年2月10日出版。

④ 「追悼列寧大會之通告」，『大公報』1924-03-12，第6版。

⑤ 「各團體籌備追悼列寧」，『大公報』1924-02-29，第6版。

召大家起來反抗。朱述堯說現在中國似受一種病，如欲醫治，必須實行列寧主義。^①可見其中各有訴求，希望借由列寧的反抗精神，來解決相應的問題。

以後，列寧逝世紀念日，自稱列寧主義政黨的中共都頗為重視，形成了一套格式與程式，各級黨委就此有很多指示與行動。^②每逢這一天，必然有相應的紀念，甚至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4年，當時北京還舉行了盛大的列寧逝世三十年紀念大會。

1925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四號「對北洋軍閥召開善後會議的對策」中就提出：“列寧週年紀念日（本月二十一日）各地應在可能範圍以內號召地方各團體開一紀念會。”^③

1925年1月21日，列寧逝世一週年紀念，中共發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大會對於列寧逝世一週年紀念宣言」，對於列寧在共產主義史上的地位進行了界定，“全世界工農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首領、教師、同志”，是馬克思之後全世界最偉大的人，表彰列寧創建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認為全世界都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列寧主義就是資本帝國主義專權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消滅帝國主義的唯一武器”，而中國工農則受到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的雙重壓榨，時勢有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只有站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下，實行列寧主義，與全世界工農聯合消滅帝國主義，才能脫離重重壓迫與奴隸地位。^④

同日，陳獨秀發表「列寧與中國——列寧逝世週年紀念日告中國民眾」，提出若要真紀念列寧，“只有接受列寧遺訓——聯合全世界被壓迫者，向全世界壓迫者作戰，為脫離被壓迫的地位而戰”。^⑤

列寧逝世一週年，北京各界又在北大三院大禮堂開會紀念，到會約三千人，汪精衛、馬敘倫、蔣夢麟等與會。“會場設在西操場大禮堂，門外高紮彩坊一座，並架以蘇俄與中國國旗各一面，場內四壁皆掛有紅布長聯，上書‘列寧雖死，列寧之主義永遠生存’‘列寧是世界唯一不朽的領袖’等等字樣。會場上並散放數種印刷物，並極精美之列寧紀念像片兩張”。開會前，奏國際歌一曲，聲音雄壯。李大釗主持會議並致開會詞，“略謂今日為列寧週年忌日，我們今天開會紀念他的意義，因為他是世界革命指導者，同時又為東方被壓迫者的良友”。後由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致辭，注意到中國當時“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條約”高唱入雲，表示蘇俄政府願中國人民成功。加氏演說畢，“主席請全體起立，三呼‘列寧主義’‘世界革命’‘中國國民革命’萬歲。”^⑥

1925年2月9日下午二時，千餘人在上海小西門中華職業教育館舉行列寧逝世一週年紀念會，有韓覺民主持，“事前曾組織籌備會，備列寧相片數千及‘我們為什麼紀念列寧’之傳單數千”，出席者有蘇聯駐滬領事波納麥倫克及隨員維爾特等四人，日本記者，招待員分發傳單及列寧相片。“韓覺民主席略謂，今日之紀念會有二義，一為紀念列寧先生，一為紀念二七殉難諸先烈。”稱“列寧先生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主張扶助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之獨立，吾人今日紀念先生，不但因先生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並因先生為被壓迫民族起來作解放運動的指導者”。而“二七”慘案被害者也是“因要求工人階級的自由，謀被壓迫者的解放而犧牲”。

波納麥倫克氏演說“列寧先生死了，當時各處工人哀悼之悲，無異於死其家人，列寧是不死的，現在死的不過列寧的身體，列寧的學說是永不死的，列寧在幾十年爭鬥得來的理論也是永遠

① 「列寧追悼大會開會記」，《大公報》1924-03-25，第6版。

② 參見各種革命文件集，擬今後專題討論。

③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第316頁。

④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大會對於列寧逝世一週年紀念宣言」（1925年1月2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第268-269頁。

⑤ 獨秀：「列寧與中國——列寧逝世週年紀念日告中國民眾」，《嚮導》第99期，1925年1月21日出版。

⑥ 「昨日之國民紀念列寧會」，《順天時報》1925-01-22，第7版；「記昨日國民紀念列寧大會」，《京報》1925-01-22，第2版。

存在的。列寧是被壓迫階級的首領，全世界的被壓迫階級無不依列寧之指導而得解放”。國民黨人邵力子則感歎“今中國有像列寧先生一樣的領導中國群眾做革命的人物，現在病得非常危險，我們極希望我們的領袖健在，我們更應以蘇聯為榜樣，大眾團結得格外堅固”。顯然指的是此時已北上的孫中山，孫氏病情已相當嚴重。

眾人後唱國際歌，三呼列寧萬歲，並攝影，乃散會。^①

1926年1月21日，列寧逝世二週年紀念日，瞿秋白發表「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國民革命」，提出中國民眾紀念列寧，應當考察中國現時革命發展和世界革命無產階級、列寧主義的關係。^②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四川人、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中共代表陳毅撰文紀念列寧，認為五卅運動的爆發、反奉戰爭的勝利，全國要求成立國民政府的呼聲都是列寧在蘇俄取得勝利後的影響，“尤其重要的是工農階級表現了他領導國民革命的力量，使一般敵人驚嚇恐懼”，中共以列寧主義為武器，“這一年間在中國——從滿洲里到廣州，使帝國主義卻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八十多年，“直到現在——世界革命領袖列寧逝世之第二年——才受了一個打擊，至少喪失了一塊久為他的殖民地的地盤”。他甚至擴展到整個世界，認為除了中國，“敘利亞、摩羅哥的血戰，土耳其、波斯、蒙古的崛起，這些都是列寧主義在俄國勝利後的影響”。工農問題不解決，民族問題沒法解決，並表彰列寧婦女解放的主張。^③

陳毅此文本來是寄給徐志摩的，想在“善於反宣傳的『晨報』上吐露一點消息”，沒想到徐志摩不僅沒登，儘管誇了列寧，但說列寧是“一個造警句編口號的聖手”，陳毅是“弄弄火，搗些小亂子”，“盲從一種根據不完全靠得住的學理，在幻想中假設一個革命的背景”。^④

陳氏遭此際遇，稱引上海一新聞大家一向主張社會主義，想不到內地一遊看見很多貧苦的人，回去就不主張共產了，認為徐氏對內地情況恐怕一樣隔膜，“恭請徐先生到內地去旅行一次”。

在陳毅看來，列寧主義是一整套能最後解放工農階級的理論與策略。工人農民要爭取在世界上生存的權利，就該起來改變生活，促使他們覺醒。並且表示，國民黨本年度工作計畫是特別重視工農運動，“眼見擁有五十萬黨員的革命政黨走向民間了，徐先生你們怎麼辦呢？快造一段新聞來抵制罷！可憐的人！坐在資產階級的墳墓上，壞了你一世的聰明！”

陳毅讓徐志摩不要怕列寧，列寧是受苦人的武器，用以保衛自己，受苦人沒有不崇拜列寧，因為列寧能解救他，“徐先生不要責備共產黨人鐵的心，鐵的手，你且看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寶刀，與學士文人們的刻薄的刀筆罷”，甚至警告徐氏“不要以為趁熱鬧弄弄水弄弄火搗些小亂子是看不在乎的”。^⑤

這裏面火氣甚重，不知道是不是後面搗毀『晨報』館的導火索。

三 以紀念促聯合：孫中山逝世後的列寧紀念

列寧去世一年零二十天，抱病北上的孫中山也不幸去世，人們將孫中山與列寧聯繫起來。國民黨內部對於是否聯共本來就有不小的分歧，孫去世後，國共聯合分裂危險加劇，為此，中共方面紀念列寧時，注意將其與孫中山相提並論，以便促進國共合作。這在列寧逝世二週年紀念上表現得尤其明顯。

大會由徐謙主席並首先致詞，接著蘇駐華大使加拉罕、內蒙古國民黨執行委員郭道夫及韓國

① 「列寧逝世一週年紀念會紀」，《申報》1925-02-10，第14版。同版有周君常博士函述的「孫中山病狀別報」。

② 秋白：「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國民革命」，《嚮導》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出版。

③ 曲秋：「紀念列寧」，《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聶元素等整理，第191-194頁，原載『京報』副刊1925-01-21。

④ 志摩：「列寧忌日：談革命」，《晨報副刊》1926-01-21。

⑤ 曲秋：「答徐志摩先生」，《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聶元素等整理，第195-200頁，原載『京報』副刊1926-02-04。

代表講話（用英語，由李翻譯），最後李大釗演說。

李大釗將孫中山與列寧進行了系統的比較，他開篇就提到追悼列寧就想到中山。“前兩年我們在廣州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列寧的噩耗傳到廣東，先生親自出席大會來報告這不幸的消息，曾經有很沈痛的演說，使得到會的同志都有感動，都不能忘”，感歎1925年紀念列寧時，孫中山已經病入膏肓，不能發展他的抱負了。“所以我們同時感覺列寧的死是個損失，中山先生的死也是我們的損失”。國民革命局勢緊迫，兩次失去領袖，損失何等重大，責任何等重大！

李氏又比較了二者人格的偉大，無論朋友、信徒、仇敵，沒有不承認，遇到反動不灰心失望，“列寧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們應該服膺這種精神！”

他認為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策略，中山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革命的理論與策略，中山主義與列寧主義理論上可以聯成一貫，策略上也能聯貫一致。列寧主義者與中山主義者可謂不分彼此，都是革命的主義。只是環境不同，“假使中山生在俄國，他一定是個列寧；假使列寧生在中國，他也一定是個中山！”

惋惜孫中山限於環境出師未捷身先死，孫中山跟列寧一樣，主張聯合弱小者幫助弱小者，再來實現中國的革命，主張聯合世界革命；主張以黨治國，“列寧以無產階級的黨治國，中山主張以國民黨”。孫痛定思痛，將革命遺志交給我們，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就是他自己將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親手給連接起來了。”李氏最後鄭重說，“等到中山主義勝利的時候，也就是列寧主義勝利了！”^①

李大釗此處與其說在悼念列寧，毋寧說更側重在悼念孫中山，尤其是表現出對於孫中山所宣導的國共合作破裂的擔憂，“我們那裏好分出什麼此疆彼界來”，“無論列寧主義者或中山主義者都不應該兩下分離”，列寧主義信徒與中山主義信徒應該緊緊聯合，個中的憂慮之情溢於言表。

李氏還翻譯了與會韓籍志士發言，此人去國十多年，視自己為中國人，認為中國革命運動有重大意義，四萬萬人解放了，是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得著自由。中國軍閥混戰應任其自相殘殺，趁此驅逐帝國主義，提出中韓民族聯合起來。^②背後的關懷，更多在於拯救其祖國。

1927年1月21日，列寧逝世三週年，陳獨秀發表「列寧逝世三週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引述列寧「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認為中國革命存在多種可能，國民政府若按照國民黨綱進行，則可以完成中國革命；如把右派看得太重，“不能斷然制止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西山會議上海大會一貫到底的右派思想與政策在黨內日漸得勢”，革命將墮入危途。

陳強調負有革命使命的國民黨是孫中山的寶貴遺產，援用孫中山對於國民黨的忠告與告蘇聯書，希望國民黨黨員謹守中山遺訓，繼續中山未竟之業，造成革命中國，最後提到孫中山逝世紀念日快到了，不由得想到列寧與孫中山對於中國革命的遺言。^③

同日，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共產黨人熊雄號召學生“應是最勇敢的列寧精神之模仿者！”雖無列寧殊勳，卻該學習列寧早一點確認革命人生觀，做“完成中國國民革命、促進世界革命之急需的工具！”不能不與蘇俄一條戰線，孫文主義不能不與列寧主義發生相得益彰。

黃埔軍校有一格言“我們的靈魂是孫文主義、列寧主義；因為孫文拿東方的弱小民族做主力軍，另一只手卻拉著西方的無產階級做後援。列寧拿著西方的無產階級做主力軍，另一只手卻拉著東方的弱小民族做後援”。熊氏提出列寧與孫中山如果在世，都會彼此相助，號召向二位先賢學習，表示願意為此“同路去死”。^④

① 節錄自「列寧逝世二週年紀念大會紀事」，『政治生活』第66期，1926年1月27日出版。

② 節錄自「列寧逝世二週年紀念大會紀事」，『政治生活』第66期，1926年1月27日出版。

③ 獨秀：「列寧逝世三週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嚮導』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出版。

④ 熊雄：「列寧與黃埔學生」，『黃埔日報』1927-01-21。

四 作為中國青年榜樣的列寧

除了政治策略的考慮與政治領袖的紀念，當時人也發掘了不少列寧的特點尤其是閃光點，將其看做中國革命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榜樣。

陳獨秀著重澄清對列寧的誤解甚至污蔑，稱列寧遠非所猜想的“極惡窮凶的怪物”，倒很像樸實的教授，活潑的工人，內心充滿對於弱小民族的同情。陳氏還引用列寧在『火星報』上對於義和團時期俄國侵略中國的指責等，由此“可看出他對中國及中國民眾之同情是何等誠摯”，認為要真的紀念列寧，就得回應列寧的遺訓，聯合世界被壓迫階級，向壓迫階級開戰。^①

惲代英則讚美列寧，有智識的，有能力，有品格，成就了一個最有權威的革命領袖。列寧是革命家的好模範，不因失敗而頹唐，不因成功而精神懈怠。他敢於行動，不顧議論，“他一點不躁急，亦一點不疲緩。這使他成就為一個從來未有的革命偉人”。

除了稱頌列寧的革命精神，惲代英認為列寧很有學問，他是一個學者，最注意俄國情形，以研究態度，“從唯物史觀得著了俄國革命成功的關鍵，他亦從各種學術中，得著了俄國革命以後一切行政的方針”。

那麼，如何預備做中國的革命家？他提出，學列寧，不怕艱苦，不貪安逸，不恤譏議，不顧怨謗。改造中國，絕非“脆嫩骨頭的青年所能勝任”。不要像某些青年求學問為出風頭，搶飯碗，談玄學，看輕實際問題。虛驕的自信，不可能成為未來革命領袖。與有組織的舊勢力接觸日多，會成為屈服的俘虜。

那麼，出路何在？惲氏以為要像列寧領導蘇俄革命，造一個有主義、有紀律的黨來宣傳與組織工農士兵，得他們擁護，替他們爭利益，解放受壓迫者。^②

2月9日，惲代英就提倡要對社會科學下一些功夫，進而研究救國，這或許是從列寧那裏得到的啟示。^③他還在『上海追悼列寧大會特刊』發表「列寧與新經濟政策」，稱讚列寧懂得變通。^④

楊賢江除了哀悼列寧，強調列寧可以做中國青年模範，作為革命家、學者，窮困力行，“刻苦了、研究了究是為了什麼？”革命如何入手，如何預備，列寧可以提供教訓。在同日另一文中，楊賢江批評青年自私與不問政治的傾向，提出要推翻腐朽階級，無論政治革命社會革命，都必須結黨，如東南大學附中組織合作社就是一種有效方式。^⑤

前引文，熊雄讚揚列寧只知他是時代的革命工具，為時代所需而死，不圖私利私名，不僅服務一個國家，是為全人類；事事講科學，非常虛心，勇於改過；不與敵人妥協，不白白引起人反感，“他的意見才能雖然超眾，他卻始終服從黨的紀律而不專斷！”所以，一切愚夫愚婦認他為救世主，為他的死痛哭流涕。^⑥

一個完美無缺的革命領袖形象呼之欲出。

在最需要座標的時期，不少小知識分子歧路彷徨，列寧由一個小知識分子竟然成為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他是如何成就的？列寧之路，由於有效，對於不少人有著潛在的示範效應，那就是加入組織，成為有理想肯實幹的革命家。

五 制止、批評與漠然：頌揚之外的聲音

列寧逝世時，北洋政府尚未與蘇俄建交，在其控制區域，悼念列寧成了一個敏感的話題，時有反復，甚至時不時遭到阻止。

① 獨秀：「列寧與中國——列寧逝世週年紀念日告中國民眾」，『嚮導』第99期，1925年1月21日出版。

② 代英：「列寧與中國的革命」，『中國青年』第1卷第16期“列寧特號”，1924年2月3日出版。

③ 代英：「再論學術與救國」，『中國青年』第1卷第17期，1924年2月9日出版。

④ 代英：「列寧與新經濟政策」（1924年3月9日），『惲代英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155頁。

⑤ 楊賢江：「列寧與中國青年」「到青年中間去」的先驅者」，『學生雜誌』第11卷第2號，1924年2月5日出版。

⑥ 熊雄：「列寧與黃埔學生」，『黃埔日刊』1927-01-21。

1924年1月26日，北洋政府眾議院決定致唁電悼念列寧。^①但是，當北京學界聯合會原定4月6日在北京中央公園舉行悼念列寧大會，後來因中央公園董事會擔心有損花木，改為3月30日下午1時舉行，事先還收羅列寧照片和著作，刊印了數萬份準備發放，還提請員警廳派員照料。29日晚，籌備會主任熊希齡接到京師員警廳通知，追悼會突然被員警廳以“中俄交涉停頓，外間謠言繁興，深慮此舉引起紛擾”為由叫停，要求向政府接洽，如不批准，則不能舉行，後舉辦方派名流去員警廳疏通也未果。^②

是年8月，熊希齡等覺得北洋政府既已正式承認蘇俄，那麼列寧悼念可以提上議事日程，於10日下午3時召集各籌備主任在中央公園水榭開會，由於距列寧逝世已經不短，改為紀念會，擬在中央公園或萬生園建列寧紀念碑，並向莫斯科要一座列寧塑像來華安放，準備向外交當局交涉。^③

立列寧碑，有人很早就以為然，認為中央公園剛給已故美國總統哈定建碑，又要給列寧建碑，可歎黃興、蔡鍔、宋教仁死後“北京人們竟不曾給他們豎一塊二尺高的石頭”。^④

正如前面提到，列寧去世後，除了國共兩黨的悼念與頌揚之外，也不是完全是稱頌的聲音，也不乏批評的聲音。

面對各地悼念列寧，北洋政府最初是默許，但是隨著形勢尤其是北伐的興起，北洋政府對於相關紀念活動開始嚴厲禁止。

1927年年初，天津『大公報』稱各團體和學生崇拜列寧者每年必開紀念會。“本年因正在討赤軍興之際，不能公然活動，故未舉行”，在津蘇俄民眾也僅秘密紀念^⑤。高壓之下，紀念偃旗息鼓。

到1930年代，每逢列寧逝世紀念日，國民黨控制區如臨大敵，如1933年天津就“今日(二十一)為蘇俄革命領袖列寧逝世紀念日，省市當局奉令防範共黨乘機活動，市公安局特於前日令飭所屬於今日一體注意、並切實防範不逞之徒乘機滋事，以維治安云”^⑥。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抨擊列寧的言論，如在一份浙江軍人所辦雜誌上，憲漢雖然讚賞列寧，但認為棺雖蓋而論未定，列寧“一意孤行，必欲達其所系之目的而後止”。^⑦還有全面否定者，稱列寧是“革命的叛徒”，“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功後實際上已經死了”，表面勞工專政，“若真正的勞動者要起來專政，於共產黨自然有大不利的地方，故他們必要壓迫勞動者，使勞動者無真正活動的能力，以便好儘量為他們利用”。^⑧『國聞週報』登載譯文「列寧論」，譯者按語稱列寧是偉大人物，應有公正和深刻瞭解。譯文整體讚賞，不過結尾却說列寧會用一切方法實現計畫，“願意犧牲一大部分人類來豎立那社會革命的勝利”。^⑨

揆諸當時輿論，類似批評除了國民黨開始反共後的刊物外，似乎未形成聲勢，再考慮到此前北大朱務善等的民意測驗結果，這說明，列寧崇高的革命形象已經得到了較多認可。

那麼，列寧逝世在當時知識界的反響如何呢？我們從時人日記入手，發現大多淡然視之，楊樹達、胡適、顧頡剛、夏承燾、吳宓、吳虞等十餘人的日記中對此要麼根本不提，要麼就是寥寥幾筆。胡適稱“今日報上有兩件大事，一為列寧之死，一為英國勞動黨內閣之成立”^⑩，吳虞則

① 「昨日眾院開談話會 催發歲費 電唁列寧」，『晨報』1924-01-27，第2版。

② 「追悼列寧未成會」，『京報』1924-03-31，第3版；「禁阻追悼列寧 大會臨時停開」，北京『益世報』1924-03-31，第3版；「昨日列寧追悼會未開成」，『晨報』1924-03-31，第6版。

③ 「將建列寧紀念碑 列寧追悼會將與外部接洽」，『晨報』1924-08-11，第4版。

④ 「哈丁紀念碑」，『晨報』1924-02-25，第6版。

⑤ 「列寧紀念無可記 俄僑秘密集會說」，『大公報』1927-01-27，第7版。

⑥ 「列寧逝世紀念 公安局飭屬注意治安」，『大公報』1933-01-21，第7版。

⑦ 憲漢：「精神之列寧」，『兵事雜誌』第118期，1924年2月出版。

⑧ 芾甘：「列寧——革命的叛徒」，『學匯』第477期，1925年2月20日出版。

⑨ 柏克曼：「列寧論」，劍波譯，『國聞週報』第3卷第8期，1926年3月7日出版。

⑩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167頁。

記“飯後閱報，俄列寧於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時五十分逝世”^①。相對而言，對列寧逝世的關注更多集中在國共兩黨及其追隨者，一般知識界對此相對超然。

六 結語

列寧逝世後，中國各界展開了各種討論與紀念，列寧所領導從蘇俄革命及其組織方法成了國民黨改組的範本，也成為他們贏得蘇俄支持的護符，孫中山與國民黨悼念列寧具有某種實用考慮，悼念列寧其實是一種思想動員，整合黨內反對國共合作者，同時也是一種示好蘇俄的姿態。中共將紀念列寧當作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指針，孫中山逝世後，又成了中國共產黨批評國民黨右派、維繫國共合作的利器，而列寧的經歷與人格也成為中共念茲在茲的榜樣，內化於心，借此吸引與培養更多革命追隨者。如何將列寧紀念作為革命鬥爭與革命奮鬥的助推器，黨派意見很有排他性，借此塑造列寧及其主張的神聖性。通過塑造列寧光輝的革命形象，為當時不少小知識份子提供了可能的示範效應，那就是投身革命。北洋政府及批評者則借抵制、批評列寧，來提醒世人注意可能的過激化。不少大學教授則對列寧逝世頗為淡然，甚至有像吳宓一樣語帶譏諷者。

孫中山本人引列寧為同志，孫中山逝世後，不少人也把孫中山與列寧相提並論，甚至還將列寧與當時世界著名政治人物進行比較，在一較長短中彰顯列寧的特殊性和自己的政治主張。不過，隨著北伐的成功，在部分國民黨人看來，國民革命已經不再那麼迫切需要蘇俄的支持，再加上反共的需要，國民黨核心層很快試圖將列寧主義架空，用三民主義進行重構，進而為其反共張目，這一架空的手法看似高明，未曾想，加上國民黨清黨，此前因為注入列寧主義而給國民黨帶來的活力，某種程度上也消失殆盡。如果說清黨是從組織上削弱了國民黨^②，那麼架空列寧主義則是從思想上削弱了國民黨，黨同伐異與實用主義的色彩很重，這一後果還有待後續追蹤。

無論是反對者還是贊成者，都借著評價列寧表明自己的政治社會姿態，由此來提倡或反對列寧的主張，甚至還借著悼念列寧來表達對於國內外各種壓迫的不滿，列寧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符號，在各種政治社會場景中成為綿綿不絕的話題庫與力量場。

列寧死了，作為身體的列寧離場，作為精神的列寧彌散開來，在蘇俄如此，在中國也如此，隨著革命巨浪的激蕩，列寧的精神與思想將深刻地改變中國這片土地。

[責任編輯：馬慶洲]

① 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吳虞日記』（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154頁。

② 參見王奇生：「清黨以後國民黨的組織蛻變」，『近代史研究』5（2003）。